



和平论

〔挪威〕约翰·加尔通 著

陈祖洲 舒小昀 刘 成 译

陈仲丹 卢彦名 熊 莹

陈仲丹 审校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论/[挪]加尔通著;陈祖洲等译.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8-132-X

I. 和... II. ①加... ②陈... III. 和平学
IV. 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676 号

© Copyright 1996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本书中文版权由作者约翰·加尔通授权,为南京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或以数据库存储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05-112 号

书 名 和平论

作 者 [挪威]约翰·加尔通著

译 者 陈祖洲 舒小昀 刘 成 陈仲丹 卢彦名 熊 莹

审 校 陈仲丹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邮编:210018;联系电话:025-83283871)

网 址 <http://www.njpbs.com> /www.njpbs.net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沈丽国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718-132-X/D·3

定 价 48.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序	言	(1)
导论	对 21 世纪和平的展望	(1)
第一部分	和平理论	(13)
第一节	和平研究：一个认识论的基础	(13)
第二节	和平研究：一些基本的范式	(35)
第三节	女人：男人=和平：暴力？	(59)
第四节	民主：独裁=和平：战争？	(72)
第五节	国家体系：分离式、联合式、邦联式、联邦式、集权式	(87)
第二部分	冲突理论	(103)
第一节	冲突形成	(103)
第二节	冲突的生命周期	(119)
第三节	冲突的转化	(130)
第四节	冲突干预	(150)
第五节	非暴力冲突转化	(166)
第三部分	发展理论	(186)
第一节	发展理论与实践的 15 个论题	(186)



第二节	六个经济学派.....	(202)
第三节	外在性.....	(223)
第四节	折中发展理论的 10 个论题	(255)
第五节	发展理论:一条跨越空间的路径	(268)
第四部分	文明理论	(284)
第一节	文化暴力.....	(284)
第二节	六种宇宙学:一种印象性描述	(306)
第三节	含义:和平、战争、冲突、发展.....	(324)
第四节	详述:希特勒主义和里根主义	(350)
第五节	探讨:对病态宇宙学有治疗方法吗?	(362)
结语	和平与冲突、发展与文明.....	(380)
附录	文献目录.....	(397)

中译本序

陈仲丹

加尔通教授的名著《和平论》已经译就,再经校对、终审几道工序,就可送去付印,不多久便可登堂入室,赫然立于櫺架的群书之间,静候好书者投以慧目,开卷有益了。我对这本书中文版问世的情形有所知晓,也参与了一些有关的工作,算是个知情者,故而就借此机会向读者诸君述说一二。

要介绍《和平论》先要从“和平学”说起。在今日,和平学是一门显学,正引起政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国家要实现和平发展,民众要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具体的和平实践就都需要理论指导,而和平学就是阐述相关理论的一门学科,当然会成为热门学科。说起来这门显学却是新兴学科,至今历史不到半个世纪。追根溯源,1959年挪威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创立一般被认为是和平学建立的标志。而这一研究所的创建者也是首任所长,就是本书作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教授。

加尔通1930年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年轻时就读于奥斯陆大学,获得过社会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对和平问题有兴趣并专事研究。在当了十年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后,他曾去美国夏威夷大学担任和平研究的专职教授,还较长时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过和平学。另外他曾短期讲学的地方就难以计数了,可说是



足迹遍及全球。他也曾来中国讲学,因为那时中国的学术界还不了解和平学,所以这位“和平学之父”在中国教授的是国际经济方面的内容。

创立一门学科,要完善它,就需要多多著述,以使之充实。加尔通是位勤于写作的学者,几十年来出版的著作不少于 50 部,论文多达千余篇。他每到一地讲学,发表的演讲也是字字珠玑,充溢着哲人智慧的火花。2005 年 3 月,我亲耳聆听了他的演讲《和谐致平之道》。这篇演讲是在中国谈论和平学理论,加尔通教授也入乡随俗地增加了与中国有关的例证。比如他称:“对于和平学研究来说,中国传统医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很欣赏中医理论中深层次的文化和思想,即对于阴阳平衡和阴阳失调的认识,因为在冲突中也同样有平衡和失调。”后来,我们根据录音把这篇演讲整理成文字,先是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全文选刊,说明中国的学界很欢迎对加尔通和平学理论的介绍。若是把这类演讲全都录音整理成文字,数量说不定会超过他的论文。

当今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地球竟有了“地球村”的名头,世界各地间的联系自是大大加强。学术界也不例外,无论什么新学科都会或迟或早地传播开来,和平学这门新学科也就西学东渐慢慢地传入中国。先是我所在学校的钱乘旦教授得风气之先,率先倡议在南京大学开展和平学研究。我有幸被钱教授选中充作这支小小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幸运的事还不止一桩,没多久我就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去英国的考文垂大学研究和平学,得以与该校和平研究机构“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的几位学者相识,常听他们提到加尔通教授,耳熟能详,逐渐了解到他在和平学领域的泰斗地位。进而我又读了他写的几本书,对他



深邃的思想和精密的议论更是感受深切。本来我对和平学的看法多有误解,比如认为这门学科是由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发展延伸而来,而加尔通则力言这是一门有着自身完整理论构架的全新学科,不是由其他姊妹学科综合、演绎而来。另外我本认为和平学是门重在实践、行动的学科,理论尚不完备,学理性也不够强。读过加尔通的著作后方知自己因浅学而多谬见,和平学理论之深邃、严密当不下于有着几千年学科发展史的哲学。本书就是一例,想来读者开卷后会有同感。

因感佩加尔通其人其学,我就生发出一点期望,期望有机会能在他的几十本著作中选出一两本译出介绍给国内读者,如能由他本人选定某本就更好了。幸运的是这一期望不久就成了现实。2005年3月,我们在南京召开了国内的首次和平学研究会议,名为“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有一大亮点,当时住在法国韦尔松(Versonnex)小城创办“超越和平发展中心”的加尔通先生也受邀参加了会议。为能及时与会,已是75岁高龄的加尔通自己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办签证。几经周折,鹤发童颜的加尔通终于与他的日本籍夫人如期出现在会场上。他先是发表了那篇前面提及的演讲,继之又参加讨论,畅谈他对和平与冲突的看法,有时是长篇大论,仿佛要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把他几十年积累的学问全部倾倒出来。在会议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找到机会,向他表达了希望能翻译他一部代表作的意愿。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似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位和平老人竟从随身携带的包中拿出一本书,说这是他最好的代表作,值得译成各种文字,让尽可能多的人读,接受和平观念,为实现世界和平出力。面对此情此景,竟让我对和平的真意有了一点新的感悟:和平的意义在于给



予,而不是索取。几天后,加尔通回法国。临行告别时,他的眼神中似有期许之意,或许是希望他留下的这本书能早日化身为千百,表达的仍是原意,只是文字改。

读书人要想出书理所当然要找家愿意接纳的出版社。加尔通的这本书虽说是名家名著,上上品的好书,但学术性强的好书未必能在商战的图书市场上奏响凯歌。有出版社愿意承担吗?当然是有。早在我与加尔通接洽前几年,在南京就另有一批关心和平学研究的热心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朱成山馆长在国内比较早地提出了要开展和平研究,并创办了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另外,南京出版社社长李海荣也关注和平学研究,并将这一选题定为社里的重点项目。有这样的契机,我没有出城就为加尔通的书找到愿意承接的出版社。

加尔通的这本书原书名为《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和平与冲突,发展与文明》,作为书名嫌长了一些,我曾设想将之简化为《和谐致平之道》,又觉得不够妥帖。忽有一日,想到此书讲述的全是与和平有关的理论,何不就以《和平论》为书名,念起来响亮,又与内容合拍,岂不两便,这就是现在书名的由来,也算是我给它起的一个中文名字。

加尔通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代表作,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也随身带着。他称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系统地为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以及和平行动奠定理论基础”,所以说这是一部和平学的奠基之作。“和平学之父”为和平学建构理论大厦,将这座大厦分成了四层,也就是四大理论:和平理论、冲突理论、发展理论和文明理论。这就是现在和平学理论涵盖的全部范围。当然新学科体系的生长离不开对原有老学科的采纳吸收,和平学理论中的不少内容



就是汲取了国际关系、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养分,但这些只是构件,经加尔通整合加工后,建成的却是一幢崭新的和平学理论大厦。

在翻译工作开展后,译者们发现要想做好这一传译工作颇为不易。一是此书的学理性强,涉及范围广,对译者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要求很高,光是涉及的文字就有多种。加尔通先生懂六种文字,不时会用到,这还不包括他常使用的拉丁文。作者的母语是挪威文,他用英文写作这本书,这里面又添了一层语言上的缠夹。加尔通先生极有理论创新意识,在行文时多有发散性思维的神来之笔,这对提高著作的学术价值很有意义,但对翻译来说就又添了一重困难。总之,种种原因使得翻译工作无比艰难,仿佛在大风天当传话人,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一句话,但也少不了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据说翻译如同摆渡,高明艄公撑船过河,波澜不兴,乘客浑然不觉;寻常艄公也能摆渡过河,但让乘客饱受风浪之苦;庸劣艄公则让乘客过不了河。或许这本书的翻译能称得上是寻常艄公,译文大体能传达原著的信息,但有些地方读起来有点晦涩,意思不够明畅。不过让人宽慰的是,几位译者是尽了力的,多是数易其稿,如译者陈祖洲交给我的是第七稿,如果时间宽裕,或许他还会有第九稿、第十稿。清末的严复先生曾将翻译的标准定为“信、达、雅”,但知易行难,真正要做到还要花费无量的译事修炼功夫。拉丁箴言曰:“凡人皆有舛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力避翻译中的差错。尚望读者多加指正,有以助我。

具体的翻译工作分工为:刘成,第一部分;舒小昀,第三部分;陈祖洲,第四部分;卢彦名,第二部分 1—4 节;熊莹,序言、导论、结语、第二部分第 5 节。我承担了全书的统稿和审校工作,拾遗补缺



地译了少量文字,并编制了一份文献目录。还有一位对本书问世的有功之臣不能不提,这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沈丽国。她所付出的劳动不亚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尤其是因为此书的特点,编这样的书特别累人。我想是为和平事业尽力的义工精神在激励着她,不避繁难地当这一苦差。好在让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终于以艰辛的劳动完成了加尔通教授的嘱托。

书于南京

2005 年 12 月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序 言

编写本书的目的旨在介绍和平研究,但其意义在于为诸多方向的探讨提供新的方法,而不是提供基本的简易读物(导论一章有这种功用)。那些对书中探讨的四部分中任何一部分涉及领域已有些了解的人,会发现整本书更有用。

和平政治学是软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它要依靠精英阶层所做的具体决定。此外,还要依靠那些从事自己和平政治学工作的人:依靠他们在个人和家庭内部(总有许多事要做)的微观层次上努力,依靠他们在社会的中观层次上努力,依靠他们在社会间甚至是地区间冲突的宏观层次上努力。在所有这些层次上,在以和平的方式趋向和平的意义上还有这一政治学扩展的空间。

但主要的政治决定都是军事和经济的实际内容,在本书中是在“冲突”和“发展”这样范围更广的标题下来探讨的。接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是我们的文明中仍较为深层的现实,尤其是我们深层的文化、深层的宇宙观,这些在其他三个领域中对确定我们的行为很有影响。

本书的四部分是在对和平研究主要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后所得的结果:

和平理论

冲突理论

发展理论

文明理论



不过,本书是唯一将这四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著作。

为了将这四部分相互独立开来,有一些重复内容。另一方面,所有内容都要聚合在一起,所以各部分列出了许多参考文献,还有结论。

有一点我要提出警告,我不认为,主流的安全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IR)、冲突研究、经济研究和文化理论可以算作和平研究,需要做的事只是把它们合在一起,然后进行跨学科对话。事情正好相反:必须对它们从一开始就进行重新思考,要做的事比我后面篇幅探讨的可能要多得多(顺便说到,我的这些内容也是多年积累而成,这一任务不用说是困难重重的)。

因此,对和平和暴力都必须将其在总体上进行考虑,在生活组合的所有层次上进行考虑(不仅仅是在人类生活的层次上考虑)。国家间的暴力是重要的,而性别间和代际间的暴力甚至更重要。个人内部的暴力,即心灵内部(比如情绪压抑)的和身体内部(比如癌症)的暴力也是重要的。此外,整个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和平,而不仅仅是和平研究,有一种非实在主义的认识论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有明确的价值和治疗方案,而不是一宣布诊断后就停止活动。

冲突远不止是肉眼所见被看作是“麻烦”的直接暴力,它同样也是被凝固为结构的暴力,以及使暴力合法化的文化。要消解派别间的冲突,所需的就不仅仅是将它们间的关系进行一种新的构造,而是要对冲突的派别自身进行改造,以确保冲突不会一再地出现。对大多数派别间的冲突来说,总是有派别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本书中,主流的经济学主要被看作是文化暴力,对于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有意隐瞒并故弄玄虚。绝大多数的原因和结果由于被当作主流理论与实践之外的“外因”而变得隐而不显。



通过对它们明确的阐述并且将其融合进理论和实践,经济结构也许会少一些暴力色彩。

其次,文化理论所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工艺品,而是注重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后者既存在于集体的潜意识中,也存在于为特定的文明界定为规范和自然的假设当中。对文化的强调不应该与一个黑格尔派会接受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定的“唯心主义”混淆起来。更确切地说,出发点在于人类生命有机体中本能的匮乏,虽然必须行动,但却难以将每次行动都当作所遇到的第一次来决定对策。一定存在着绕过个体意识的某种编制程序和自动性。对单个的个体来说,这一程序就是所谓的“个性”,它积淀在个体的潜意识中。而对一个文明体的成员来说,这种集体程序在这里会被描绘成“宇宙论”,是集体共有的,并被下意识地假定。

作为潜意识的存在,这些假设仅仅是被规定的,而不是可以被讨论的。而作为集体的潜意识,在确保所有其他人一致行动方面则有强制性。引导并不产生于由观念所支配的拉动力,而是来自宇宙论、法则以及集体程序的推动力。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即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有意识保持的信仰体系是不重要的,但它们远非唯一引导人们行动的因素。

让潜意识里的东西被意识到,我们也许就能从绵延的结构暴力以及反复出现的直接暴力中解脱出来。或许,这同样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代的西方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及为何说主流经济学是对某一类型西方文明中所包涵的深层假设的一种释读。针对主流的冲突和安全分析,某种同样的观点也认为,它的大部分工作只是对集体的潜意识假设所做的一种释读,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简而言之,在我们从事和平研究时,一个首要的任务是要将我们自己从学术文化的暴力中解放出来,这一暴力由于存在的时间太久而变得愈加暴烈,而不是趋缓。接下来的一个任务是不要变成那些自命为解放者的人的囚徒——这些解放者中也包括本书作者。

我要对以下这些大学的众多学子表达深深的谢意:阿利坎特(Alicante)大学、伯尔尼大学、欧洲和平大学、开罗大学、纽约城市大学、杜克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墨西哥圣地亚哥大学拉美社会科学部、柏林自由大学、古吉拉特·维迪亚皮特(Gujarat Vidyapith)和平研究中心、夏威夷大学、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杜布罗夫尼克大学交流中心、奥斯陆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昆士兰大学、萨尔州大学、四川大学、特罗姆瑟大学、赫尔德克维滕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和平研究所。感谢他们与我进行了无数次的积极的、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对话。我还要对民生基金会(Right Livelihood Award Foundation)表示感谢,该会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资助。

我还要深深感谢迪特·费舍尔(Dieter Fischer)、苏珊·霍伊维克(Susan Hoivik)、海约·施密特(Hajo Schimdt)、哈坎·韦伯格(Hakan Wiberg)以及我的批评者彼得·劳勒(《一个价值观问题:约翰·加尔通的和平研究》)。在我的这本著作中,有对他所说问题的回答,但争论肯定会长期延续。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妻子西村富美子,她教给我有关和平与冲突的东西比任何人都要多。

约翰·加尔通

夏威夷檀香山

1995年3月

对 21 世纪和平的展望

一、和平：诊断—预后—治疗三角

和平研究与医学研究非常相似，以至于也可以运用诊断—预后—治疗这种三角公式。现有一套有关（行为者、细胞）系统健康状态与有病状态的普遍观念。^① 来自医学的一对词“健康与疾病”与来自和平学的一对词“和平与暴力”可以被看作是这些更宽泛标签的规范性说法。

在实际中，这两种状态都需要“诊断”（或分析）——不仅仅是针对暴力与疾病。和平与健康同样都有着它们的条件和环境，不同于暴力与疾病的条件，但又可以说与它们有关。因此，和平的一个条件或许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过，假如单个行为者自身出现了某个问题，那么在一个非剥削性的系统内也有可能存在暴力。同样，健康的一个条件是人体关键参数的一种稳定平衡，哪怕是一个细胞或一个细胞群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开始超出原有的比例关系也是不行的。

和平研究者必须在各种范畴（自然、人类、社会、世界、时间、文化）内

^① 一个人可感觉到健康或有病，但行为者的系统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的，尽管健康和有病的状态或“运转良好”和“不运转”可以被归结于此。从医学而来的“疾病”这个词可以被看成与后者有关。不过由谁来决定，又通过什么标准？我们是倾向于“主观主义”（由人们自行决定是否患病）还是倾向于“客观主义”（由他人按照其标准来决定是否患病）？我倾向于两者皆是。相互间对话，这是从“阴阳”观（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推导出的唯一可能的结论。人们常常因为疾病产生一种个人的低迷状态，而社会也许是通过一次猛烈的打击，如一场入侵，才见识到该社会的威力和弱点。不过，那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常常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注：本书附录部分为引文相关文献的英文目录，可供查阅。



寻找原因、条件和环境。这一跨学科的谱系会让和平学变得富有挑战性，在学理上变得艰深，在实践中出现问题。但另一方面，一种狭隘的关注视野预先就是注定要失败的。^①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该系统脱离了原有的“健康状态”，表现出有病的症状，那么在一份精确的预后书上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系统是否有足够的自我恢复到健康状态的能力，或者是否需要他者的干预。

不应该把外来的干预同治疗扯到一块。首先，这样的干预有可能使这个系统实际结果变得更糟；其次，自我也许同样有能力提供足够的治疗；再者，自我恢复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意识、主动的干预。这个系统也许绝对可以“自行照看”。我们的身体有通过超复杂的机制恢复平衡的神奇能力，这些机制连我们自己都很难搞清楚，更不用说去影响它们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可恢复的功能提供积极的条件。^②

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三角形的第三个角——“治疗”，指的是自我或他者有意识地推动系统再次回到通向某种健康状态轨道上的努力。与消极健康和积极健康之间的差异极为相似，和平也是正好位于治疗性疗法和预防性疗法之间。所有这四者都代表了没有（或略有）疾病或暴力。这个系统（几乎）是没有症状表现的。但在消极的案例中，几乎存在所有可以说到的东西。平衡是如此不稳定，以致于哪怕是稍有冒犯就可以使这个系统退回到有病的状态。而在积极的案例中，平衡比较稳定，意味着有

^① 一个例子就是冷战期间仅仅狭隘地关注相互威慑和政治宣传，而冷战后开始发生的事表面看起来已经结束了。多原因导致的或者多条件决定的问题要求有多范畴、多层次、多层面的补救措施。医学中的通行处方“心理—身体”就是对此的一种认同，如果能修改成“社会—心理—身体”就更为恰当。甚至于官方的分析也是如此，例如，对前南斯拉夫的冲突的分析依然沿用冷战的思维方式：只有两派，每一方都是政府，谁也没有被记为是一个坏人还是好人等等。

当然，这一简单幼稚的想法存在于冷战之前（参见第二部分第一节第四小节）。不过，一个合理的猜测是，那些思想倾向被冷战定型的人将前南斯拉夫的冲突看作是冲突的同态构造，即塞尔维亚对应于共产主义的心脏地区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对应于波罗的海国家，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对应于天主教的波兰，还有南部的一些穆斯林。

^② 对于恢复健康，最典型的例子是合理的膳食以及锻炼习惯，换句话说，就是生活方式。而对于恢复和平，一个例子是保持交流渠道的畅通。



着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即便这个系统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症状表现。治疗性疗法针对的是前者,预防性疗法针对的是后者。两者对于健康与和平都是必需的。

二、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三角

显然创建和平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减少暴力(治疗)和避免暴力(预防)。暴力意味着损害和(或)伤害。我们接下来假设存在某些会遭受损害和伤害的东西,然后遵循佛教的传统将那些东西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生命有能力承受施加于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这里分别指的是身体和精神暴力。不过生命也能承受幸福,身体和精神上得到愉悦满足。对这种感受,一些人也许会保留“积极和平”的提法。^①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待了暴力。假如有一位发送者,一个存心制造这些暴力结果的行为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谈谈直接暴力了。假如没有,那我们就谈谈间接暴力或结构暴力。^②“不幸”是遭遇的一种形式,因此暴力肯定存在于某处。这里采取的立场是“间接暴力=结构暴力”。间接暴力来自社会结构本身——来自人类之间、人类的(社会)群体之间、世界上的社会群体(联盟、地区)之间。并且在人类内部也存在着产生自个性结构的间接的、非故意的、内在的暴力。

外部结构暴力的两种主要形式的名称因为经常出现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已经广为人知:这就是压迫和剥削。两者都作用于身体和精神,但并不一定是故意的。然而对受害者来说,后一点并不能提供多少安慰。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文化暴力,它的一切都有象征意义,在宗教和意识形态当中,在语言和艺术当中,在科学和法律当中,在媒体和教育当中。

^① 在这里不这么叫的一个原因是尝试更多地“和平”看作一个基础的而非上层的观念,这一点是许多人都可以接受的。越是具体地界定和平,其内涵就越丰富,达成的共识就越少。

^② 换句话说,这种结构是暴力传播的媒介,与物理学上讲到重力、电力和磁性时所用到的“场”很相似。可以以殖民主义为例,最初输入的用于构建所谓殖民主义结构的强暴力,在经历了外在的非殖民化过程之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